

中共昌图地方党史

第四辑

(文革时期)

(1966.5—1978.12)

昌图县史志办公室

2011·9

序　　言

中共昌图县委书记 刘 雁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阴谋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说，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必须从总体上对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给予彻底否定。长期的动乱，使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的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10年间，因冤、假、错案被迫害致死和受到牵连的人达1亿多；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严重停滞和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历史文化遗产被洗劫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相当程度上的被毁弃，假、恶、丑的现象重新出现；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纷争严重泛滥，党和人民饱尝了动乱之苦。

1966年文革浪潮开始在我县蔓延和泛滥，县委、县政府工作活动被停止，各级领导干部和无辜群众被揪斗、批判和毒打，有的致死致残。在“打砸抢”过程中，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国营商店被抢、银行被强行提款，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社会秩序被严重破坏。经历了10年浩劫，全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损失惨重，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是彻底否定这个时期的一切。必须看到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这种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

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严峻考验，证明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其中许多同志在遭受严重打击、诬陷而蒙受屈辱时，仍然密切地关注着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和发展前途，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工作，发挥党员作用。同时，他们又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他们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永远被铭记在人民的心中。许多遭受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群众，都未动摇过他们的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立场。

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标志着十年“文革”结束。

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为探求真理的徘徊时期，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中共昌图地方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编辑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第一部全面真实反映我县“文革”时期的活动及社会现状的史书，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全县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都应该认真研读这部史书。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学习研读这部史书，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和认识我县“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解剖历史，总结分析10年浩劫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从而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有利于我们党员干部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执行党的方针路线的自觉性。进而坚定信念，同心同德，为建设繁荣进步的新昌图做出更大贡献。

目 录

第一编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昌图动乱的蔓延	(1)
第一节 “文革”前昌图的社会背景	(1)
第二节 “文革”全面展开 动乱在全县漫延	(8)
第三节 革委会成立 极“左”政策全面推行	(25)
第二章 整顿与反整顿的斗争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59)
第一节 整顿与反整顿的斗争	(59)
第二节 工农业生产在曲折中发展 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	(111)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26)
第三章 “文革”十年昌图县组织机构沿革.....	(135)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昌图县地方党组织序列	(135)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昌图县政权系统组织序列	(178)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昌图县地方军事系统组织序列	(234)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昌图县统一战线系统组织序列	(236)

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昌图县群团系统组织序列

(236)

第二编 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第四章 政治局势的稳定与组织上的拨乱反正 (241)

第一节 开展揭批查运动 (241)

第二节 平反冤假错案 落实干部政策 (262)

第三节 清理打砸抢案件 (276)

第四节 农业学大寨 普及大寨县运动 (277)

第五节 整顿、调整领导班子 (289)

第五章 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291)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 (291)

第二节 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303)

第六章 徘徊时期昌图县组织机构沿革 (313)

第一节 徘徊时期昌图县地方党组织序列 (313)

第二节 徘徊时期县政权系统组织序列 (337)

第三节 昌图县地方军事系统组织序列 (368)

第四节 昌图县群团系统组织序列 (369)

大事记 (371)

“文革”回忆录 (382)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和昌图动乱的蔓延

第一节 “文革”前昌图的社会背景

1964年，正当全县人民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一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席卷整个昌图大地，它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

早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了要在全国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之后，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河北省保定地区进行了“小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中共湖南省委用三个月的时间，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培训了生产队长以上各级干部120万人。这些干部在接受培训之后，有了这样的认识：“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也是严重的。”湖南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应该“彻底地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大张旗鼓地刮东风，打击敌人，遏制黑风。”

毛泽东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保定地区“小四清”的经验，并据此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这次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运动，逐步地向全国推开。

中共中央认为：“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①。1963年9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被正式确定下来，一切工作统统被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由于“左”的思想指导，采用许多强制、错误的方法，把一些被怀疑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对在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干部，往往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视为坏人，被请“上楼”。造成了“不搞不知道，一搞吓一跳”的错觉。

昌图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从1963年9月开始；1964年全面铺开，1966年12月9日社教工作团撤出昌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行结束。

1963年9月，全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开始，县委分别组织了工作组，县委领导亲自参加试点工作，全区试点单位共有10个，并于1964年9月先后结束试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为“四清”运动（清工分、清帐、清财、清库），1964年秋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②。

12月3日，辽宁省委发出《关于在全省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全区各县相继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省委的决定，宣讲两个文件（双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③。

12月13日至24日，昌图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宣讲两个文件（双十条）。并在昌图城公社、宝力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④。

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3年5月20日〕

② 〔《铁岭党的活动大事记》中共铁岭市委党史研究室、铁岭市档案局（馆）（1991）〕

③ 〔《铁岭党的活动大事记》〕

④ 〔《昌图县志》昌图县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办公室编，1988年12月第1版〕

1965年12月25日至29日，中共昌图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昌图老城工人俱乐部召开。会上，听取了赵连吉代表前届县委作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大寨精神，为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任务而奋斗》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县委员26名，组成中共昌图县第五届委员会。在五届一次全委会上，选举产生了县委常委11名，副书记4名，书记1名^①。这是“文化大革命”前，昌图县召开的最后一届党代会。“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正是中共昌图县第五届委员会执行工作期间。

1966年7月，“地区社教工作团”进驻昌图，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12月下旬撤出。社教工作团总人数11850人，其中有军级、地师级、县团级及科营级以上干部366人^②。社教工作团分别深入到全县37个农村人民公社，4个城镇，10个农林场，528个生产大队，3766个生产小队，全面开展“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教工作团根据1965年1月，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神，于8月7日制定了《昌图县社教运动全程安排设想》。农村的“四清”运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即从工作队进村到十二月末，约五个月时间，为“四清”和对敌斗争阶段；从1967年年初到4月，为建设阶段。运动全程初步安排八九个月时间。运动的大体路数是：交来意，亮旗帜，大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前十条》《二十三条》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掀起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初步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放手发动群众，开好大队和公社“两个会”，从清政治、清思想入手，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教育干部洗澡放包袱，解放干部大多数；在团结两个大多数的基础上，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及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和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本主义搞臭，进行思

①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昌图县组织史资料》

② 《昌图县志》昌图县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办公室编，1988年12月第1版

想上“纲”；清理专政对象，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斗争有严重破坏行为的四类分子，落实监督改造措施；深入集中“开门”整党，改选大小队干部，系统解决干部，特别是领导核心的革命化问题；大揭生产斗争盖子，重点解决生产斗争中的方向、道路问题，以大寨精神落实生产规划和有关生产管理制度；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结合“两揭”暴露的问题，系统地向社员群众进行（四个主义教育）；放手发动群众，对社教运动进行全面地大复查、大验收、大总结。

大队、生产队根据“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社教运动的步骤把“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揉和在一起进行。在宣传“二十三条”的同时，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在揭阶级斗争盖子时，先从揭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黑帮黑话入手；在“两斗”中，要抓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作反面教材，大反“和平演变”，大反资本主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建设阶段，要以思想建设为中心，狠抓毛泽东思想在干部和群众中扎根工作，开展群众性的兴无灭资的思想教育，通过正面教育，破“四旧”立“四新”，办好社会主义文化室，占领农村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使人民公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①。

1965年8月10日至14日，中共昌图社教工作团委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并发了会议纪要。《纪要》明确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要自始至终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运动，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运动。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运动；坚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掌握运动的性质和重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运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充分走群众路线，抓好整党建党工作，抓好领导核心的革命化；抓革命，促生产，建设一支革命化的工作队。这些要求都必须贯彻运动全程，要自始至终地抓好”。“要从文化大

① （中共昌图县社教团委文件）昌社委字（66）021号

革命入手，大揭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盖子，首先清政治、清思想。要强调敢字当头，打破束缚群众运动的各种框框，放手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要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前十条》、《二十三条》、《十六条》，放手发动群众，紧紧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斗争这个纲，把清政治、清思想突出起来，充分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及反毛泽东思想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根据群众要求，在适当时机，对他们展开批判和斗争”^①。“放手发动群众，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在揭发形式上，可采取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以及大会揭、小会揭、面对面揭、背靠背揭等方便群众的揭发形式揭深揭透。边揭发，边编辫子，进行分析综合”^②。

昌图县两级干部会议，于 7 月 24 日开始，8 月 4 日休会，历时 12 天。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县、社两级领导干部，和县直所有中层领导干部，以及农、林、场、站，县属工交、财贸、文卫等基层单位的党、政领导干部，共计 256 人，会外县直机关还有 500 多人，总计 800 多人。

会议的重点是揭发县委领导核心（包括副县长）的问题，突出文化大革命，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资产阶级思想行为。

整个会议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会内会外相结合方法进行的。

会议开始进行了动员，然后用三天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关章节及中央《前十条》《二十三条》，印发了焦裕禄同志的模范事迹，并聘请了昌图 2 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作了报告。在学习当中讨论了本县的阶级斗争形势，所谓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然

① [中共昌图社教团委文件]昌社委字(66)021

② [中共昌图社教团委文件]昌社委字(66)021 号

后由赵连吉同志代表常委向大会作了检查。会议认为检查的不全面、不深刻，主要问题检查的不深不透，引起与会者的不满。由此，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背靠背的揭发批判。最后由各组选派代表 90 多名，针对常委的主要问题，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根据群众要求，最后用 2 天转入横扫，对中层领导干部的问题进行揭发。

总的说来，这次会议在社教团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与会同志自始至终革命热情高昂，战斗力旺盛。绝大多数同志在鸣放揭发中，没有顾虑、敢于革命，敢于斗争，共贴出大小字报 1600 多张，揭发问题 2000 多件，所谓县委领导核心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会议揭发岀县委副书记黄金臣、宣传部长（常委）庞振华、副县长高文、宣传部副部长王德云等人在文化教育界抵制毛泽东思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集中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二）、和党的教育方针唱反调；（三）、抵制党的阶级路线，不要对知识分子改造；（四）、以反对教条主义名义，影射攻击我们党的领导；（五）、抵制和反对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六）、包庇坏人，为坏人服务。二、常委集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不突出政治，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的不高；（二）、忽视阶级斗争，阶级界限不清；（三）、弄虚作假拒不执行党的政策；（四）、讲排场、图阔气，保官保命，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工作上缺乏革命的精神；（五）、常委之间不团结，思想不统一，行动不一致。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下步安排拟在县直机关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狠抓文化大革命、思想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继续深入地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将揭发出来的问题，依靠群众自己编辫子，自己核实，并准备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点人进行批判，再掀起一个揭发、鸣放高潮。深入揭发一切抵制毛泽东思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以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凡是错误的东西都要揭发批判。

常委集体第一次的检查，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和群众的要求距离很大，在群众面对面揭发批判的基础上，暂时休了会，安排一段当前工作，准备继续开扩大会。

10月10日，昌图社教工作团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总结前段工作，人为的认定昌图县敌情严重：下二台人民公社敌我不分，丧失阶级立场的社队干部205名，占全社干部总数的40%；通江口人民公社白家大队党支部的7名支委都是三四类干部。社教工作团紧紧结合整党，初步排队认为县直党政群机关112名副科长以上干部中，好的仅4名，问题多且性质严重者44名，占39.2%。人民公社（镇）348名专职委员以上干部，发现问题多的110名，占31.6%；性质严重的26名，占7.5%。生产大队1790名正副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中，问题多的844名，占36%；性质严重的184名，占10.3%。对34个公社（镇）、5个农林场的722个党支部也进行了排队。其中问题多而且性质严重的党支部有305个，占42.2%。这些支部的8322名党员中，不具备共产党员条件者2234名，占26.8%。又认为双庙子、牤牛、马仲河、老四平、满井5个公社的90名大队书记中，有地、富、反、坏分子5名，蜕化变质者20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3名，合计占总数的30.1%。昌图的敌情在制造中不断扩大。

昌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仅仅进行近5个月时间，就按着上级的指示精神纳入“文化大革命”之中。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揪斗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30名，揪斗所谓“牛鬼蛇神”880名。

通过这场活动，阶级斗争的范围越斗越广，“阶级敌人”的数量越斗越多，造成了阶级斗争十分严重的假象。

如果我们借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一名句来形容当时昌图的社会形势，想来还算贴切。

第二节 “文革”全面展开 动乱在全县漫延

一、贯彻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

1966年2月3日,为反击由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引发的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极“左”思潮,彭真主持召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

2月5日,刘少奇召集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了《二月提纲》(草案)。经彭真修改,在京常委审阅同意后,报给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吴冷西、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对这个提纲没有表示反对,于2月12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党。

《二月提纲》尖锐地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就在中共中央研究和拟定《二月提纲》的同时,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由江青出面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会后,陈伯达与张春桥共同修改,并经毛泽东先后修改过三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份纪要,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并加批语说:“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

实践证明,江青搞的这个《纪要》的危害极大。“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全盘否定了文化艺术界的成就,整个搅乱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极大的助长了“怀疑一切”的思潮。

继而又发生了震惊全党的“彭罗陆杨事件”。“革命大批判”之火越烧越烈，势头越来越猛。对吴晗的批判株连到同吴晗一起用“三家村”的专栏写文章的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诬其为“三家村”，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发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关锋（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这两篇直指北京市委，字里行间充满杀气的文章又引出了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和5月1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迅速发展到对《二月提纲》、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左”倾错误已蔓延到全国各地。

1966年5月12日，沈阳地委（铁岭市委前身）召开常委会议，除学习和讨论了《东北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还确定了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读书会和组织广大干部和工农群众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批判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13日，《沈阳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大家起来奋勇上阵坚决打垮反党黑帮》的社论，在全区范围内开始批判“三家村”。5月24日，地委向地专机关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28日至6月4日，县委常委参加地委召开的读书会，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方面的文件。之后，昌图县召开了有县直单位、公社及中等学校党组织有关人员的会议，传达了地委常委、县委常委读书会精神。

二、向教科文卫系统派驻“文化大革命”工作组

1966年5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城镇中学学生率先“造反”，围攻教师和领导干部^①。

^① 《昌图县志》

6月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报道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很快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以批判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

6月中旬,昌图县农业局贴出大字报揭批本县的“三家村”人物。接着县直各单位出现了“四大热潮”,于7月上旬开始揭摆县委常委问题。从8月5日至9月24日,昌图县共贴出“声讨三家村”大字报7360多张^①。

所谓昌图“三家村”的黑干将,指的是中共昌图县委副书记黄金臣、昌图县副县长高文和县委文教部长王德云。

宝力镇一名小学教师画了一幅水彩画,名字叫《鱼游浅底》,被诬为和毛主席“力争上游”的总路线唱反调,遭到批判。七家子公社一名教师写唐杜牧《清明》诗前两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被说成是“仇视社会主义”,横遭批斗。

大字报除了贴在墙上以外,有的还贴在老师的办公桌上、椅子上。学生给教师戴高帽、进行批斗、围攻、游街、剃鬼头、抹花脸,学校秩序相当混乱。面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学校领导束手无策,纷纷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县委反映情况,请示对策。

针对上述异常情况,6月下旬,县委按上级指示,派工作组进驻老城高中,不久,又相继派工作组进驻全县各中学、厂矿、企事业单位。沿用“四清”方式,对干部、工人、教师、学生进行了排队,并点名批判。”^②。

6月18日,老城高中部分师生强迫工作组表态批斗该校校长王德宏,校内秩序更加混乱不堪。

工作组按照县委的指示,组织师生认真学习中央文件,试图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遏制学校、基层单位的混乱现象。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学校中揭发、批判教师的行为不断升级,对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骨干教师,曾有政治历史问

① 《铁岭党的活动大事记》

② 《昌图县志》

题、家庭出身不好及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教师进行批斗。有不少被认为是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而遭批斗的教师，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挂牌示众和抄家。此时的工作组进亦难，退亦难。一方面要支持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又要因势利导，制止他们的某些偏激行为和错误做法，这样势必引起部分学生对工作组的误解，甚至产生对立情绪。工作组虽然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仍无力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焦点之中，陷于愈来愈被动的地位。7月下旬，昌图高中学生驱逐工作组。

根据江青、陈伯达、康生的片面汇报，毛泽东严厉地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①。中央于7月28日决定撤销工作组。

7月29日，按中央的指示精神，县委撤回派驻县高中和其他各单位的工作组，学校里无政府状态逐步升级，并迅速波及社会，全县动乱开始。

正如刘少奇在7月29日出席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讲话时说的那样“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其他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②。

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8月10日，为适应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的需要，按上级部署，昌图县成立“昌图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领导全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三、昌图“三家村”事件

1966年5月上旬，全县根据各地动态和报刊就理论上进行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6月上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县直机关各单位结合四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②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清运动开始上挂下连，揭发批判领导干部问题，县委机关干部张广忠起草了所谓揭露县委阶级斗争盖子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说在文化、教育、卫生、宣传等方面执行了一条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矛头直接指向了原宣传部长王德云，县委副书记黄金臣，副县长高文等同志。有人证实在 6 月中旬县农业局部分人效仿中央编造了昌图的三家村大字报，诬陷原县委副书记黄金臣为“三家村”村长，副县长高文为“三家村”的村副，宣传部长王德云为“三家村”的急先锋黑干将。并说他们结党营私，另立县委等内容。接着县直各单位开始出现诬陷、攻击党组织随便批斗领导干部的热潮。

7 月上旬四清工作团进入机关，按四清工作要求，运用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做法开始揭摆县委常委的问题。同时各单位也相继开始。大字报上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靠边站，党的组织陷于瘫痪。凭借一张大字报就可以把领导干部打倒，任意罗织罪名把许多党员、干部、群众戴上三反分子黑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

8 月 8 日中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县直机关接着十六条要求在四清工作团领导下在 8 月中旬左右民主选举了“文革”领导小组，即县委文革领导小组。主任张广忠、副主任苏居正、王海臣，成员有董汉林、陈淑云、李春发、张武、高丰、李纯良、刘景山、杨太民。县人委文革领导小组主任闫永和、副主任卫爱民、博景顺、邵国兴，委员：卢秀峰、吴洪学、杨自强、杨树森、肖景飞。同时县委、县人委两院又组成了文革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张广忠，成员有卫爱民、博景顺、杨自强、肖景飞、王海臣、董汉林等。

文革领导小组成立以后在 8 月 24 日由张广忠主持，四清工作团参加，召开了核心组会议。决定在 9 月上旬左右召开揭批“三家村”大会。并作了工作安排。一天晚上在县人委礼堂召开了揭批